

意识形态与 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本书是作者在美国工作期间，对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研究著作。本书的出版，对于了解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宏毅等◎著

Иде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ям
« СССР »
КНР



人民出版社

意识形态与 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张宏毅等◎著


人民
出版社

本专著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张宏毅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

ISBN 978-7-01-009031-3

I. ①意… II. ①张…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苏联
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俄罗斯③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
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826 号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YISHI XINGTAI YU MEIGUO DUI SULIAN HE ZHONGGUO DE ZHENGCE

张宏毅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6

字数:398 千字

ISBN 978-7-01-009031-3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编写组

项目负责人：张宏毅

著者分工（按撰写章节先后排序）：

张宏毅 导言，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

茹 莹 第二章，大事年表

宋晓芹 第四章，参考书目举要

李振广 第五章，索引

序 言

这里奉献于读者的专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①,是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国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人们的思想下手。^②

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制约。它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辩证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和巨大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

① 尽管苏联直到1922年12月30日方才成立,但美国对于苏联的政策则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即已开始,并一以贯之地延续下去。因此,此处所指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

② 参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1期,第16页。

行为规范体系。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某一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有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也有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与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而恰恰不存在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而自行消失。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特的功能和生命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以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思想和精神力量（或如现在人们所称的“软实力”）加以认真研究和运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它不仅重视捍卫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意识操纵”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①，还千方百计地要在世界上取得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并把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工具，以最终达到实现其世界霸权的目的。在 20 世纪，其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国的精力最多，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威胁性也最为明显。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将本书主要内容确定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根源和特点及其在对苏联和中国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和产生的后果。

这些年来，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对苏联、中国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取得很大的成绩。

目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论述美国意识形态及其在外交上运用的论著已大量面市，直接或间接涉及这一论题的历史、政治著作

^① 参见[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中译本）（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 页。

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已译成中文而为人们熟知的、专论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的有1960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提出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Ideology and Foreign Affairs)(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美]迈克尔·H·亨特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美]雷迅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等。未译成中文的有爱德华·韦斯班德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洛克自由主义范例》(Edward Weisband,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73)、西尔维亚·伍德柏著《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衰退》(Sylvia Woodby, Gorbachev and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1989)、彼得·柯林斯著《共产主义失败后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的胜利?》(Peter Collins, Ideolog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The Triumph of Liberal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1993)和陈杰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实例研究》(Chen Jie, Ideology in US Foreign Policy—Case Studies in US China Policy, Connecticut 1993)等。

苏联和俄罗斯方面也在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苏联时期,曾出版由苏联科学院美、加研究所撰写的《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两卷本(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и Канады,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Двух Томах, 莫斯科1984年版,其中许多内容直接论述有关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苏联学者Э. Я. 巴塔罗夫等著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识形态战略》(Э. Я. Баталов, И. Е. Малащенко, А. Ю. Мельвил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ША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莫斯科 1985 年版)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 В. В. 索格林撰写了《美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从奠基者到 20 世纪末》(В. В. Согрин, Идеология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стории—От Отцов-Основателей до Конца 20 Века, 莫斯科 1995 年版),有助于从思想渊源上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俄罗斯还有相当一批著作探讨苏联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失足的,如[俄]谢·卡拉-穆尔扎著《论意识操纵》(С Кара-Мурза, Манипуляция Сознанием, 中译本上下册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和[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著《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 Гибель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中译本见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等。此外,俄罗斯学者还发表一系列有关意识形态的文章,如,С. А. 切尔诺夫撰写的《美国对苏态度的政策分析:系统的周期性的态度》(С. А. Чернов,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истемно-Цикл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见《美加经济、政治和文化》(США и Канада Экономика-Политика-Культура), 2001 年 6 月)、芬·尤兹攸的《俄国和西方:文明冲突?》(фэн Юйцзюнь,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Конфликт Цивилизаций? 见《21 世纪自由思想》(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1) 2000 年第 10 期)、弗拉基米尔·索格林的《西方自由主义与俄罗斯改革》(Владимир Согрин, Запад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 见《自由思想》(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年第 1 期)和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意识形态杂记——第三支柱》(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Третья Опора, 见《21 世纪自由思想》(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1) 2005 年第 2 期)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几篇。

中国学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关注这一问题。其中,一些文章和著作直接、间接涉及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问题。1988 年张宏毅发表《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文(《世界历史》1988 年第 6 期),2000 年王晓德推出《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1 年刘建飞著《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2007 年王伟与戴超武合著《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 年)》(人民出版社版),王立新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姜安著《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兼评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年版)。一些从人权外交角度研究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的文章和著作也陆续推出。如,张宏毅主编的《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陆镜生编著的《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7 年版)、李世安著《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等。

上述研究成果尽管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对于我们深入探讨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对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无疑都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始终感到,有一项研究工作是必须做、也是有条件做好的,那就是将苏、中两国进行比较研究。作为美国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对象国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都是宣称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苏联由于自身的种种问题,最终在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走向

解体,而中国却在逆境中再度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使这种比较具有科学性和深刻的借鉴意义,除了对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特点有科学的正确的把握,还必须对苏、中两国的历史现状及特点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尽管我们水平有限,但在撰写过程中力图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帮助读者从比较和鉴别中获得某种真知,为我国的健康发展提供某种历史借鉴,我们也就会由此而感到极大的满足。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认真学习了理论和相关历史著作,另一方面搜寻与研究了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和论著。《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既是重要理论著作,又具有重要文献价值,都是我们写作的理论依托和事实依据。我们还引用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冬梅主编的《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1981)》(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以及我国已公开解密的中美关系资料和相关回忆录提供的资料等。对于美国方面的原始材料,引用较多的有,美国国务院负责编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其中包括由陶文钊主编、牛军副主编翻译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历史文献——国会季刊》(Historic Document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外交政策背景材料”》;《美国总统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出版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第 1 辑,以后各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 卷本)(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以及部分运用了大学缩微胶卷国际组织(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提供的材料,等等。有关英文杂志,参考得最多的是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此外还有美国《当代史》(Current History)、美国《共产主义者与后共产主义者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等。

我们还尽量收集和运用了部分俄文原始资料和论著。如,新公布的俄罗斯 20 世纪文献:《苏美关系(1934—1939)》(Советск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4—1939)—Россия 20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莫斯科 2003 年版;《苏美关系(1939—1945)》,(Советск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9—1945)—Россия 20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莫斯科 2004 年版;《苏美关系(1945—1952)》(Советск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9—1952)—Россия 20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莫斯科 2006 年版;《俄美经济关系(1933—1941)文献汇编》(Россия и СШ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3—1941)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莫斯科 2001 年版等,以及发表于《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1 世纪自由思想》(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和《美、加经济、政治、文化》(США и Канада Экономика-Политика-Культура)等杂志上的新文献及研究论文,其中不少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А. Ф. 多勃雷宁—Г. 基辛格秘密渠道: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资料》(Секретный Канал, А. Ф. Добрынин-Г. Киссинджер: Документы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见[俄]《近现代史》杂志 2006 年第 5 期)等。总之,我们力求言之有据,论从史出。力戒空论和主观臆断。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按撰写章节顺序):张宏毅(序言、第一、第三和第六章)、茹莹(第二章)、宋晓芹(第四章)、李振广(第五章)。由张宏毅担任主编负责统稿。大事年表,参考书目举要和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索引,分别由茹莹、宋晓芹和李振广三位负责完成。为发挥集体作用,除实行主编负责制,从提纲的拟定到各章的定稿又都由四位作者共同讨论。当然,书中的观点,特别是论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主编负责。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除了从电子网络系统中获取资料外,主要从国家图书馆、外交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获取大量资料,他们珍藏的外交论著和原始资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前面提到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系列丛书及新近面世的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同样对本书撰写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需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绝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发展正常的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我们真诚希望中美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如能正确处理好并发展好两国关系,中美两个伟大民族如能互相学习,吸取对方的优良传统和品格,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也是世界的一大幸事。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当局今天竭力向外推销的政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并不是美国公众价值观的简单延伸。这种政治价值观已经蜕变为一种服务于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正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在美国,“当大多数人漠然处之的时候,他们把外交政策的战场交给了拥有特殊利益的人”。这些特殊利益者,“虽然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呼声才是美国国会倾听以决定美国利益的声音”。“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的,

‘外国评论家提出美国谋求统治地位问题，而美国这样做常常是对国内施压集团所作出的反应。’由于这些集团长期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单边政策和霸道行为。’”^①也正是这些人，他们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极端保守主义，高喊“民主”、“自由”，而把美国价值观中的利己主义推向极端。在实际做法上，他们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为名，公然破坏传统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否定主权国家的主权。而这些是我们绝对不会赞同与容忍的。我们的方针和态度仍然是坚持我们在第五章所引的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一项就是互不干涉内政。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强加给别的国家，但别的国家也别想扭转我们的社会主义航向。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项原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国与国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在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留有余地。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留有余地而丧失原则。西方某些人甚至想把社会主义在地球上消灭掉，这是绝对办不到的。”^②

①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44页。

② 江泽民：《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	/ 1
一、意识形态概念和功能	/ 2
二、美国是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	/ 19
三、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若干特点	/ 28
四、美国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的根源	/ 57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美国早期对苏联的政策 (1917—1945)	/ 67
一、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与 1917 年以前美国的 俄国观	/ 67
二、美国对俄国革命的态度(1905—1920)	/ 88
三、从不承认到承认:意识形态因素与美国对苏政策 的演变(1920—1933)	/ 104
四、坎坷的结盟之路(1933—1945)	/ 121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美苏冷战(1945—1991)	/ 140
一、美苏意识形态之争与冷战爆发	/ 140
二、美苏全面对抗时期的美国对苏政策 (1947.3—1953.3)	/ 161

三、缓和与斗争交织时期的美国对苏政策 (1953—1981 初)	/ 183
四、里根、布什意识形态进攻战略加速苏联瓦解过程	/ 231
五、苏联的最后解体与原苏联公民的反思	/ 251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冷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 271
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特点及近代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	/ 271
二、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内战(1945—1949)	/ 289
三、新中国的制度选择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1949—1969)	/ 310
四、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与“和平演变”因素的 提升(1969—1989)	/ 338
第五章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特点 及走向	/ 359
一、冷战结束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的强化	/ 359
二、21 世纪初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的新特点	/ 377
三、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的未来走向	/ 390
四、从世界舆论看美国“西化”中国政策的失败	/ 408
第六章 是僵化、西化,还是创造活力?	/ 413
——美国意识形态进攻在苏、中产生不同结局 引发的思考	
一、美国意识形态进攻的必然性和威胁性	/ 414
二、教条僵化和最终西化,是苏联在美国意识形态 进攻面前走向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 418

三、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是永葆 我国社会主义生机活力、战胜“和平演变”的 根本保证	/ 435
四、几点思考	/ 447
大事年表	/ 457
参考书目举要	/ 466
索引	/ 482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

研究有关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著作,在美国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一些更是直接以“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或对外政策)”命名。人们都力图以意识形态作为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切入点,但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意识形态“难以捉摸”。例如,《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洛克自由主义范例》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爱德华·韦斯班德在书的开头就指出,“在美国,强有力但又难以捉摸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①而由美国学者迈克尔·H·亨特撰写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其前言第一句话就是:“这本小书讲的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大题目: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它大胆涉足一个充斥着混乱概念的复杂领域。”^②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一词很难有固定的含义。”^③事实上,这些也是我们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有时感到困惑的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更有必要在本书的开头对这一问题作认真的探讨。这是进一步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① [美]爱德华·韦斯班德:《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洛克自由主义范例》(Edward Weisband,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 纽约 1973 年版,第 6 页。

②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③ 同上书,第 3 页。